

建筑学报

ARCHITECTURAL JOURNAL

五十年精选

1954-2003



中国计划出版社



F426.9

3

:1

建筑学报五十年精选

1954 ~ 2003



 中国计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学报五十年精选 / 周畅主编.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4.6
ISBN 7-80177-340-3

I. 建... II. 周... III. 建筑业—大事记—中国—1954~2003 IV. F4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6533 号

顾 问: 宋春华

主 编: 周 畅

执行主编: 范 雪

编 辑: 李华东 胡惠琴 包志禹 田 华

装帧设计: 水晶石数字传媒

封面设计: 蒙安童

统 筹: 尹怀梅

建筑学报五十年精选

周畅主编

☆

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 号国宏大厦 C 座 4 层)

(邮政编码: 100038 电话: 63906413 63906414)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9 × 1194 毫米 1/16 50 印张 1228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7-80177-340-3/TU.181

定价: 480.00 元

前言

本书为纪念《建筑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

《建筑学报》创刊于1954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建国后唯一的建筑学术期刊。她记录了50年来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是研究中国现代建筑史的重要资料。在《建筑学报》创刊50周年的今天，《建筑学报》编辑部将自1954年创刊至2003年出版的424期学报经过整理、浓缩、编辑成册，形成这本《建筑学报五十年精选》。本书集中收录反映50年来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建筑思想变迁的文章、论文以及反映各时期特点和水平的设计作品。为了尊重历史，真实反映各个历史阶段的思想观点，我们如实刊登了各个时期的部分学术和理论文章，将这些珍贵史料再现给广大读者，以作为研究和收藏之用。

此外，编辑部特别邀请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建筑学报》编委会顾问宋春华，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建筑学报》编委会主任马国馨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建筑学报》前任主编张祖刚，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建筑学报》现任主编周畅为本书撰文，对《建筑学报》的发展历程、历史作用等进行了精辟评述。

本书的编辑工作得到了中国建筑学会领导的大力支持，具体工作由《建筑学报》编辑部操作完成，主要的工作人员有范雪、胡惠琴、李华东、田华、包志禹、章思文、李如珍、李涛等同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姜涌先生参与了本书的初期策划，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50年共424期《建筑学报》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加之时间仓促，人力和水平所限，因此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文章、作品的选择和取舍上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大量文字需要重新录入和校对，疏漏和错误也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编辑说明

在编辑体例上，本书正文按年代顺序排列，每年包含五部分内容：

1、目录：当年《建筑学报》的总目录。入选本书的文章、作品在总目录中以星号标出。

2、思想·理论：当年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中国建筑界创作思想和时代思潮的理论文章。文字部分全文刊出，但考虑到篇幅的限制，原文的提要、注释、参考文献以及插图一并略去。

3、时代纪录：记录当年中国建筑界的重大事件、主要学术活动，反映时代特性的一些文章、报道等。

4、设计作品：以索引的形式列出当年《建筑学报》刊载的主要设计作品，基本囊括了历年国内有代表性的设计作品。

5、图片档案：能反映当年《建筑学报》的编排特色、刊载内容的版面或者重要图片。

全书入选的每篇文章和作品，均注明刊载期号和页码作为索引信息，若读者需要了解全貌，可根据索引信息查找该期《建筑学报》或在《建筑学报50年典藏》DVD中检索。

为尊重原文的历史信息，本次编辑工作中并未按照最新的出版规范和标准对原文作重新编排。

《建筑学报》编辑部

2004年6月6日

纪念特稿

虽“知天命” 任重道远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建筑学报创刊五十周年寄语

宋春华

刚刚欢庆中国建筑学会五十华诞，又迎来了《建筑学报》创刊50周年纪念。《建筑学报》是中国建筑学会主办的国家一级学术期刊，是建筑科学类国家中文核心期刊。50年来，学报不辱使命，在宣传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建设方针，在开展建筑理论研究和建筑评论，在报道创作动态和设计成果，在介绍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新设备，在传递行业信息和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报创刊以来，比较好地配合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活动，为繁荣建筑创作，发展建筑文化，加强理论研究和举荐新老建筑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尽管50年来的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但她毕竟顽强地成长着、发展着、完善着，成为广大建筑工作者的良师益友。作为一个《建筑学报》的长期的、忠实的读者，应该向学报的历届编委和编辑部的前辈及同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面对学报50周年的风雨历程，应该向她道一声问候：“辛苦了”。作为学报本届编委会的顾问之一，又想对她说：虽“知天命”，而任重道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建筑学报》应与时俱进，迈出新的步伐，办出新的水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一、要有鲜明特色

当今，建筑类期刊门类繁多，与学报创刊初期相比已大不相同，现在读者选择的余地大多了，办刊的难度也大多了。一个刊物，尤其像《建筑学报》这类老期刊，能不能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能不能在业内继续保持较大的影响，关键要看刊物能不能保持自己鲜明的特色和品位。我认为《建筑学报》的特色在于她的综合性、学术性及权威性。

当代建筑学，已不是传统意义“房子学”的概念，它融合了更多的有关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环境艺术、生态平衡、资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与内容而具有广义性。就建筑本身而言，也要求建筑师不能只掌握好“平、立、剖”这点看家本领，而是要更多地了解和掌握新结构、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以及节能、智能、卫生等方面的新技术新成果，要融会贯通地加以综合运用。君不见，国内外一些引人注目的重要项目的中标方案，无一不是在建筑、结构、技术的结合与综合方面有了新的突破而获成功的。因此，作为一种导向，《建筑学报》的内容及栏目设置，应更具综合性，为建筑师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先进的技术平台，从而不断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建筑学报》作为一个学术刊物，其学术性自不待言，她应区别于一般的科普期刊，也不同于综述性期刊，应把有无学术价值和理论色彩作为采编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她的各个栏目，她的各类文稿，都应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即使是广告也要有所取舍，选择那些技术性强的刊登；至于学报的权威性，我想更多是一种期望，因为权威不是赋予的，也不是“树立”起来的，是要获得公认而赢得的。诚然，长期以来《建筑学报》在业内堪称一本权威性期刊，这是她长期坚持高标准办刊方针的一种结果，希望她能继续保持这一形象和品格而为读者所钟爱。

二、要有服务精神

服务于广大会员和建筑工作者是建筑学会的重要宗旨，办好学会刊物，是这种服务的重要手段，《建筑学报》要有强烈的服务精神，这种服务主要体现在通过刊物这个载体，集思广益、直言正论，言广大读者之所想、释广大读者之所疑、解广大读者之所惑，引导广大读者关注宏观大局、关注业内焦点、关注发展动向，与广大读者一起探讨树立和贯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当前，在城乡建设和工程建设方面，在房地产开发和住宅建设方面，总体的发展态势是快速而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脱离市场实际，贪大求快，甚至搞劳民伤财的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现象，如何把对业主（包括政府工程）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统一起来，这是不少建筑师的困惑；在建筑市场逐步开放的今天，面对外国建筑师的进入，我们如何一方面调整好心态，应对挑战迎接竞争，同时又看到我们的不足和差距，明白“知物由学”的道理，努力学习弥补不足，知难而进勇于实践，不至于惊呼“狼来了”无以自解、无所适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多元文化互相渗透、强势经济文化急剧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固本立根，坚持建筑评价标准，正确处理适用、经济、美观的关系，改变某些决策者（包括咨询者）一味追求新奇和“独一无二”，忽视功能和经济的倾向；如何正确看待建筑的美观是个见

仁见智的老话题，当前可以说是流行与经典、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外来的建筑形式之间激烈碰撞的时期，五方杂处，莫衷一是，应该遵循美学规律，说明白流派分野与品位高低是两个概念，对自己对别人都不应盲目，相反只要是好的美的，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借鉴；如何看待21世纪的建筑设计走向，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未来的建筑内涵何在，建筑与机器(容器)、建筑与雕塑(艺术品)还有区别吗？在当前依靠计算机支撑的以曲面和扭动为新潮的建筑形式之后，又会出现什么新花招、新卖点？我们是追赶潮流，跟在人家后面“邯郸学步”，还是另辟蹊径走出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对于不止上述的这些问题，同行们是十分关心的，同时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学报要为大家开辟对话与交流的渠道，可以在学报上开辟专栏广为研讨，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三、要有精品意识

中国建筑学会支持把《建筑学报》办成精品刊物和品牌期刊。现在，读者对学报的要求越来越高，学报要有紧迫感和责任感。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各种媒体和书刊都在各显神通争取读者，而成熟的读者总会通过比较而做出选择。《建筑学报》要想仍然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和权威性，必须在“精”字上下功夫，树立精品意识，并体现在各个工作环节上，力争做到观点精辟、行文精炼、图片精彩、装帧精美。

学报每期容量有限，刊登的文章一定要选择言之有物、立论明确、阐述清晰、观点精辟的佳作，我们主张开门见山，直言尽意，不要东拉西扯，东弯西绕；要言简意赅，言近旨远，不要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学报作为建筑类期刊，不但要图文并茂，而且图版(照片)应该精致、有光彩，计算机的高智能化，其绘图能力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但它代替不了建筑师的徒手画，我们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精彩的构思草图，而不是“超级写实”的机器画，希望看到更多反映建筑实景环境和真面目的写真照片，而不是经过电脑移植背景和“整容化妆”过的虚假形象。学报的装帧、版式要有“建筑味”，亦庄亦谐、可品可赏，雅而不淡、简而不陋。

办好学报，首先要靠编委会和编辑部各位同仁的努力，也要靠广大会员及读者的支持与帮助，学报编辑部要多听取各位编委、特约组稿人及广大读者们的意见，建立起编读之间交流通道，从而不断改进编辑工作，提高刊物的质量。让我们共同努力，耕耘好这块建筑园地，为新时期我国建设事业的新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也衷心祝愿《建筑学报》越办越好越出色，新的历程一路顺风。

筚路蓝缕 兼收并蓄 ——记《建筑学报》五十年

马国馨

今年是《建筑学报》创刊50周年。作为国内历史最久的权威建筑学术刊物，我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自1959年上大学学习建筑以后，我就开始订阅《学报》，记得当时收到的第一本杂志就是《学报》1959年9—10期的国庆十大工程的专刊。此后除极个别的几期外，历年各期基本保存完好，即使是在1960年7月—1962年6月间，《学报》由建筑学会和土木工程学会合办，有一大部分内容都是跟深难懂的结构计算理论，但还是照订不误。另外那时还经常去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淘寻59年以前的《学报》，运气还不错，买到了56年以后的若干期，所以《学报》成了我积累数目最多的一本建筑类杂志，可以不时翻阅，从中找到许多有用的资讯。从1985年起我又试着给《学报》投稿，承编辑部各位前辈的提携和指点，前后署名或执笔的文字也有近三十篇，看到印成铅字的文章除了感到那种文章发表的喜悦外，更多的是感到来自刊物的支持和鼓励。1990年起，我有幸成为第五届编委会成员，利用每年编委会的机会，除了参观学习一些工程项目之外，更增加了向其他编委和各地同行请教和交流的机会。到2002年9月《学报》第六届编委会成立，我又忝为编委会主任。由此看来和《学报》还是有着难解难分的缘分。

在和《学报》几十年的交往中，我把《学报》当作自己继续学习的老师，她教给我们许多是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我又把《学报》看作一扇打开的窗户，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国内外的最新动态和科技进展；而《学报》又是笔谈的重要平台，我都是通过《学报》和许多前辈和同行神交，相识以至成了好友；当然《学报》也是了解有关政策方针的权威渠道，——所以长期以来《学报》一直是我心目中十分重要的工具书和百科全书。

然而在《学报》已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时刻，我觉得更应该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来看《学报》，那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和观点。亚里斯多德说：“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活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五十年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时期了，五十年的《学报》是一个重要的编年记录，它是那个时代活生生的重要史料，是每一个研究中国现代建筑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利用和参考的文字历史。

（一）

研究中国现代建筑史的邹德侬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筑活动一向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现代建筑中，政治因素影响强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世界范围也算少见。”就是说在过去的年代，建筑活动已经成为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学报》也如实表现了这一政治活动进程。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年代，把建筑界比之为工程科技界中的“文艺界”是毫不为过的。因为除了大的政治运动外，还有经济建设和设计战线的各种政策变化，建筑界都首当其冲，所以《学报》的沉浮起落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学报》是在1953年10月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组织了第一届编委会，梁思成成为主任，在54年创刊，当时印数也就1000多份。在经过经济恢复时期之后，我国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当时强调向苏联学习，学习社会主义的设计思想。所以《学报》的发刊词中说：“本学报将以行动来响应毛主席所提出学习苏联的号召，以介绍苏联在城市建设和建筑的先进经验为首要任务。其次是介绍我们自己在建设中的经验，通过本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学习苏联各民族的建筑师创造性地运用遗产的观点和方法。”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已经批评了建筑中的浪费现象，此后11月，苏联召开了有六千人参加的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会议，当时的赫鲁晓夫做为苏共第一书记批评了建筑中的浪费并提出要摆脱斯大林时代的建筑上古典主义和折衷主义束缚。中国此后也下达了组织学习的决定，刚出了两期的《学报》受到批评也为此停刊了七个月。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回忆：“……出了两期之后就碰上批评建筑界的复古主义的运动，停刊整顿，差不多半年之后才复刊。”到195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对建筑中浪费现象的运动，这表现在《人民日报》自3月28日以《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为题的社论，及此后的一系列社论。“建筑中浪费的一个来源是我们某些建筑师中间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往往在反对‘结构主义’和‘继承古典建筑遗产’的借口下，发展了‘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虽然社论中也提出这种倾向“首先要由有关的领导机关负责。”但实际后来却演变成了对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建筑思想以及相关建筑师的公开批判。开始是对友谊宾馆，四部一会以及地安门招待所的批评，当然建筑界更不能置身局外，于是《学报》又在55年8月复刊，把原来的8开本改为16开本，并组织了一系列批评梁思成先生的文章，接连用三期陆续刊登，虽然这场批评在规模和方式上还是有节制的，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仍然留下了搞政治运动的烙印，并必然要归结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上来。

从百家争鸣而后又转入反右派斗争，在《学报》1956—1957年的各期中得到充分反映，恐怕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最重要记录了。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使思想活跃的建筑师群体包括专家、教授和在校学生又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在《学报》1956年第五期董大酉、戴志昂、王炯明等人，第六期林克明、鲍鼎、叶仲矾、邓焱等人，第七期张开济、邹至毅、朱亚农、李锡均等人，第九期的杨廷宝等人的文章，当时人们的心情就象林克明先生说的：建筑师从有自卑感，怕扣帽子，怕犯错误而“三缄其口”，到打消顾虑，相信“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引陆定一语）。当然也还有《学报》第六期上清华学生蒋维泓等人“我们要现代建筑”的文章，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一期间，《学报》的内容并没有太多反映“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只在7月31日出版的第七期上转载了梁思成先生7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看得出这是在6月8日《这是为什么》社论，并开始反右派运动以后的及时反应。北京建筑界是从8月起陆续召开反右斗争大会的，这些内容在《学报》的第九期，第11期得到完整的记录，反右专辑的页码从原来各期的68页增至124页。“过去是很不对头，经常闹意见”的陈占祥和华揽洪被作为“反党联盟”来揭露和批判，并在第十一期上刊登了陈、华二人“我的右派罪行”和“低头认罪”的文章，发表了学会理事长在大会上的讲话予以定性。对这段历史已有许多专著和回忆提及，故不再详述。《学报》对于这段历史，在1989年第十期专门发表了《纠正1957年学报对华，陈两同志的错误批判问题声明》对当年“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予以拨乱反正，做了必要的交代。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年代在建筑界就是在双反，务虚，红专辩论运动后的高举红旗，政治挂帅，群众运动，技术革新和革命，快速设计。《学报》也适时改为10开本，编辑部那时经常转载或发表一些政论性的文字。以紧跟当时的形势。在这一期间有关建筑方针政策的讲话和文章比重逐渐增多。在1959年庆祝建国十周年的9—10期合刊上，还专门发表了《以更大的成就来欢庆伟大的建国十周年》的社论，随形势需要而发表编辑部的社论成了文革以前《学报》的重要特色。其间随形势的变化及新的方针政策，如“大地园林化”（1960），“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调整和精简全国建筑勘察设计机构”（1962），“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1963），“严禁楼堂馆所建设”（1964）“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1964）“正确的设计从实践中来”（1964年）等均有所配合和反映。但随着毛泽东关于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示：“这些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阶级斗争也被运用到设计学术领域，随即扣了许多“高标准”、“封资修”、“洋怪飞”的帽子，《学报》又一次停刊一年。

1966年《学报》再次复刊以后，对前一段工作有所说明：“近几年中，我们一方面组织了建筑工作积极支援农业生产和为城乡人民设计住房的报道，并且配合中国建筑学会的学术会议报导了一些一般标准的住宅设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缺点和错误，主要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和划不清建筑领域中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界限。例如，几年来曾突出地报道了‘高、大、洋、古’建筑设计文章。其中，有的大谈所谓超政治的建筑艺术，有的宣扬贪大求洋的过高标准，有的无批判地推崇古典园林和古典建筑，有的盲目介绍‘洋建筑’。这些脱离现实的设计思想和学术观点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是不相符合的。”复刊后的1966年第一期除了采用郭沫若手书的刊名，页码从40页减到了32页，价格从五角降到了三角八分，取消了以前各期均附的英俄文目录外，更努力“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版面上林彪的题字，《红旗》杂志的社论，以及此后各期大量政论性的文章，图片，学习体会，批判文章，到第六期时已经完全是政治性的内容了，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林彪的国庆讲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以及批判刘秀峰《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的文章，以至有的读者批评“还不如看《人民日报》”。但就是这样《学报》仍未逃脱停刊整顿的命运，并且一停就是六年多。

当时建工部党委在写给国家建委的报告中说：“中国建筑学会长期以来为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和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把持，《建筑学报》已成为宣扬封、资、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对建筑学会，《建筑学报》的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建筑学报》必须彻底改造。”后以建工部党委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对《学报》做了宣判。

1973年《学报》再次复刊，虽然“文革”已近尾声，但由于此前对《学报》的定性，当时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等运动以及“四人帮”的干扰，看得出这一时期的《学报》十分谨慎，小心翼翼，生怕再犯错误。所以那时每期首页必登《毛主席语录》到（1976年底止）。文章中涉及伟人语录必须用黑体字（到1978年1期止），毛主席逝世时还出了仅20页的特刊（1976年、3期）。《学报》的真正解放恐怕要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1979年，在77年已开展工作的建筑学会79年4月在杭州召开会议，宣布国家建委党组撤消1966年的9号文件，为中国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恢复名誉。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的工作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不可否认的。”“为了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建筑界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所有强加于建筑学会和《建筑学报》的污蔑不实之词，均应彻底推倒，凡因参加学会组织，学会活动以及因刘秀峰的前述文章而受到迫害、株连的同志，应一律平

反，恢复名誉”。又一年多以后的1981年，《学报》在经历季刊、双月刊的变化以后，重新以月刊出版至今。后来，在办刊方式上也有所灵活，在1982年4期，尝试刊登了一页液压式结构体疲劳试验机的广告，此后广告页面逐渐扩大，至今已到15页左右，从1995年起《学报》又从16开改为大16开，纸张和印刷也更为精美，页码也由过去的70页增加到今年的96页，价格保持较为经济的20元。尤其在80年代以后，建筑类期刊杂志竞争十分激烈之际，仍能保持每月数万份的销量也实属不易。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城市化、特区开发区的建设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大规模开发，使建筑设计进入了一个更为宽松和活跃的环境，相形之下，人们更注重商业化的炒作，各级主政者更关心“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成果，而电视、报纸等更快、更直接、更形象的媒体被大量利用，信息时代的多种手段使得学术性的刊物就不象过去那样引人注目，受到许多商业化操作的冲击，因此刊物的经营自由度增大而难度也更大。

(二)

作为《学报》这样的综合性学术性刊物，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势有沉浮起落，但在五十年里它的学术性还是努力贯彻始终的，所以从《学报》可以全面地反映我国建筑设计的发展史、建筑技术的发展史、建筑类型的发展史以至建筑评论和建筑理论的发展史。从《学报》众多的栏目设置，诸如：会议论文、建筑理论、建筑论坛、建筑教育、建筑作品、设计研究、景观设计、住宅设计、作品专集、建筑技术、城市设计、建筑大师、人物访谈、建筑评论、国外建筑、评奖与竞赛等及近五十年的历时比较也可看出其发展轨迹及方向。

五十年的《学报》中，在建筑类型和技术方面占有篇幅最多的恐怕就数居住建筑了。住是人们衣食住行的四大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的主要建筑类型，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水准，并且工程建设量也最为巨大，因此受经济、政治等的影响也最大。

解放初期大量“工人新村”投入建设，大多是砖木平房或2~3层建筑，如上海的曹阳新村（1956年2期），控江新村、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邻里，三里河铁道部住宅区。从1953年“一五”计划开始，开始学习苏联的大单元设计，如北京三里河、西直门、百万庄住宅和长春一汽福利区住宅等，“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在1955年提出的五开间一梯两户或三户的通用图，平均每户63~99m²，在一种开间和一种进深的基础上，已采用了预制混凝土方孔板和楼梯跑。当时在《学报》1956年8期还专门介绍了当时苏联的一梯三户和四户住宅的设计竞赛方案，平均每户40m²。1957年2期、3期先后介绍了北京地坛北居住区和幸福村街坊的设计，分别采用了内廊式和短外廊式，除住宅单元的分析外，对于俱乐部、托幼、商业服务业、学校等附属设施也已有定额加以规定，对绿化、活动场、交通等问题也有较深入研究。同样在全国开展“反浪费”的形势下，国家规定了住宅的经济指标，当时1957年7~8期宋融和刘开济先生“关于小面积住宅的探讨”就是在当时最大地发挥投资效益，缓和住宅的紧张，并能相应地改善一些居住条件的探索。当时北京1958年的通用图户均面积为37~40m²左右，由于造价和面积指标的限制，居住条件较差，因此被称为“窄、小、低、薄”。1958年6期“大跃进中居住建筑设计方案介绍”中介绍的各地住宅单方造价为11~22元/m²（1~2层混合结构）、20~37元/m²（3~4层混合结构），还有的住宅采用土坯拱，并在土坯内配竹筋，相应的还有人民公社新建居民点的示范性设计（1959年2期），嘉定县长征人民公社居民点住宅（1960年3期）等。当然那时也有许多新技术，新材料的探索，如非蒸压矽酸盐大型砌块装配式、振动砖壁板、轻质砼外墙板等。当时提出“标准设计同样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大搞竞赛评比和集体创作，这不仅大大缩短了设计时间，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设计质量”，是大跃进的新气象。住宅为了给解放妇女劳动力创造条件，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条件，满足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还设计了“旅馆式”“公寓式”住宅和人民公社大厦。

从建筑学会1959年5月在上海召开“住宅标准及建筑艺术座谈会”以来，关于住宅问题的研究十分活跃，那时几乎每期《学报》都有涉及住宅的会议、研究和方案介绍。如戴念慈先生“关于住宅标准和设计中几个问题的探讨”（1961年3期），湛江讨论城市住宅和农村住宅问题（1961年12期），“居室的平面布置和居室大小问题”（1962年3期），无锡讨论城乡住宅建设（1963年12期），杨春茂理事长的专题讲话（1964年2期），当时也还有联排式住宅的探讨（1963年8期），上海闸北蕃瓜弄改建（1964年2期）等示范性例子，但由于当时主张“先生产，后生活”，专门贯彻干打垒精神，降低非生产建筑造价，有的设计院著文提出：“民用建筑实行‘干打垒’是设计工作中的一场革命，其优点是：可以发扬延安作风，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降低造价，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技术简单”（1966年2期）。北京市就有过240厚空斗墙的低标准住宅，简易门窗，无纱窗，无暖气，户内无卫生间，上下水分层设置，简易楼的标准让住户很难忍受。

尽管1973年复刊以后的《学报》还面临“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和“四人帮”的干扰，但住宅的调查和研究始终是《学报》的经常性课题，如“关于住宅设计问题的调查和探讨”（1973年2期），“华北地区职工住宅方案”（1974年1期），“住宅的大模板工艺”（1975年2期）。戴念慈先生还以今兹为笔名，探讨住宅建设中的节约用地（1975年3期），认为在个体平面上作文章，比增加层数在节约用地上的效果更明显。当时国家建委建研院“关于城市住宅层数问题的调查和意见”中提出大中城市新建住宅以4~6层为宜，大城市沿街建设一部分12层住宅，但不是解决居住问题的主要途径，不宜普遍推广（1977年2期）。当时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也有关于大寨公社厚庄新村，绍兴上旺大队，深县后屯大队（以上1975

年4期)、湖南农村房屋建设调查(1976年2期)等。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及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以1978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前三门住宅建设为契机,在住宅建设方面也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住宅投资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在“一五”期间占9.1%，“三五”期间只占4%，而三中全会以后的1982年即达25.4%，此后更是有增无减。无论从建设目标、供应体制、科学研究、部品开发、典型示范诸方面都迈出了极大的步伐。以戴念慈、张开济先生的一些探讨文章为开端，在理论上加以分析的论文比重明显增加。1979年全年6期《学报》中每期均有一定篇幅，其中包括对住宅建筑体系的评价、工业化住宅的建筑创作(1979年2期、4期)，总结了当时大板、大模板、砌块和框架轻板体系的得失。有对住宅形式和提高密度问题的探讨，如跃层式、灵活内墙、内院式等。也有对建成实例的分析(如前三门住宅)。此外建设部主管部门和相关科研单位的学术研讨和专题报告也使住宅的建设更加科学，更符合居民的需求及我国的实际状况。如国家科委20世纪80年代初《住宅建设技术政策要点》提出2000年每户居民一套住宅，全国人均居住面积达8m²/人的目标，而中国城市住宅问题学术研讨会则从住宅作用、体制改革、技术政策等方面研讨如何为本世纪实现城镇居住小康水平而奋斗(1984年3期)，戴念慈、林志群、白德懋、顾云昌、朱嘉广、屈浩然等专家都有论文发表。中法住宅学术研讨会(1985年2期)鲍家声先生关于支撑体住宅规划与设计的研究(1985年2期)，以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所牵头负责的《改善城市住宅建筑的功能与质量》课题组关于小康型城市住宅设计研究从住宅组团、住宅套型、住宅室内等角度进行了研究(1989年6期)。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研讨就更为活跃，如对复式住宅的讨论(1991年4期)，菊儿胡同的实验(1991年2期、12期)全国住宅网的第五届年会(1993年3期)，中国城市小康居住目标预测(1993年7期)，从三个层次十二项指标对目标内涵作出界定并提出建议。在1994年2期《学报》新设了房地产开发研究专栏，并由宋春华先生撰写了“论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对策”，表明对日益红火的房地产业的研究也提到了日程上。1994年11期《学报》还专门出版了住宅专集，据我统计在《学报》历史上共出过4次专集，前三次分别是国庆十大工程(1959年9—10期)、毛主席纪念堂(1977年4期)和亚运会工程(1990年9期)，由此可见对住宅问题的特意关照。1995年9期为推进住宅产业化，构建新一代住宅产业，报导了经国家科委批准的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2000年小康型城乡住宅科技产业工程》，并配发了“回顾与展望”“21世纪住宅设计原则”“2000年小康住宅示范工程规划设计导则”等。建设部的部和司局领导也先后就住宅问题发表谈话或论文，如叶如棠在住宅设计研讨会上的讲话(1999年2期)；宋春华“世纪之交住宅建设问题的思考”(1999年10期)、“小康社会初期的中国住宅建设”(2002年1期)、“选择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2004年1期)；聂梅生“住宅产业化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2000年4期)、“新世纪我国住宅产业化的必由之路”(2000年7期)等等。

与此同时，住宅设计方案的国际国内竞赛和评比也从另一面对住宅的健康发展加以引导。1979年的全国城市住宅方案提出要“住得下、分得开、住得稳”；1984年的全国多层砖混住宅新设想着眼于提高工业化水准；1987年的七五城镇住宅在大厅小卧室方面的探索表现出住宅已经从睡眠型向起居型发展；1989年的首届城镇商品住宅竞赛开始注重中小套型商品住宅设计和室内外环境的创造，注重从居住性、舒适性、安全性、社会性和经济性来评价，表明住宅由生存型向小康型过渡，由福利分配向商品住宅过渡。1992年中国“八五”新住宅设计竞赛，强调居住条件的改善除“量”的满足，还包含“质”的提高，而提高设计水平是关键所在。在1994年4期报道国家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2000年城乡小康型住宅综合示范工程启动，这表明将住宅的科研、开发、生产环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科技为先导，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手段，以形成小康居住环境为目标，为未来城乡住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导向和示范。同年11期专门报道了合肥、青岛、常州、济南和石家庄五个城市的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从室内空间组织、空间利用、适应性和可变性、厨卫布置、室内物理环境、室外环境的延续城市文脉、保护生态环境、组织空间序列、设置安全防卫、建立服务系统、塑造宜人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示范。1996年的住宅提出：造价不高水平高，标准不高质量好，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1997年3期报道了1996年上海住宅设计国际竞赛，国内外送交方案503个，参加单位142家，其中58家国外单位来自15个国家，其余84家来自国内，清华大学朱文一等的“绿野、里弄构想——人与自然的对话”获金奖。主办者力图通过竞赛拓宽思路，寻找新的模式。此后1999年6期“迈向21世纪的住宅”竞赛，则在以前的基础上更强调可持续发展、合理利用资源，加大科技含量，注意生态平衡。进入新世纪以后，各地房地产开发日见活跃，《学报》上的介绍较之于一般商业性的炒作更具学术性和科学性，2003年3期报导了2002年全国经济适用住宅方案竞赛结果，强调面向中低收入者的大众住宅就是服从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及部门的重点工作，建立起“中小套型——高舒适度”的“精密设计”的理念。

以上只是集中梳理了一下从五十年的《学报》中所反映出来我国住宅的规划和建设事业一个粗线条的脉络，从中看出我们在设计理念、居住水平、生活质量、理论研究诸方面的进展。其实又何止是住宅，五十年的《学报》同样是其他许多建筑类型的不断引进、研究、开发和进步的过程，如体育建筑、医院建筑、观演建筑、教育建筑、图书馆建筑、交通建筑、博览建筑……都在《学报》里留下了它们发展的轨迹。

(三)

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从宏观上看，近百年来是中外交流、变化剧烈的时代，在吸收外

来建筑技术、建筑理念、建筑文化的强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出了以往。也使中国本土建筑和外来建筑的交流由闭关锁国、步履蹒跚，到国门开放、兼收并蓄。《学报》的五十年同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与国外建筑文化的交流史、融合史、碰撞激荡史。

五十年代的《学报》努力在介绍国内建筑成就和进展的同时，反映国外的建筑动态。虽然当时的方向是“要提高设计水平，改进设计质量、克服设计中的错误，就必须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的设计思想，学习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向苏联专家学习……”（人民日报1953.10.14社论），因此一五期间在建立我国重点工业建设上基本照搬苏联的设计手法和表现模式，如长春一汽、哈尔滨亚麻厂、量刃具厂等，1954年中央建工部设计总局召开全国标准设计会议提出：“统一认识，交流经验，学习苏联，提高技术水平”。所以《学报》介绍苏联，介绍按苏联方法和范式建造的工厂实例责无旁贷，《学报》创刊号就用28页篇幅发表了三篇介绍苏联城市和建筑的文章。1956年8期用27页的篇幅介绍了苏联建筑师协会书记处书记沙洛诺夫的“苏联建筑的新趋向”的长篇论文，着重介绍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政策：“首先注意工业建筑和大规模建造的居住建筑和文化福利建筑的问题”，通过拟定成套的标准设计以符合建筑工业化的发展。并介绍了在住宅、小学校、电影院、疗养院等类型的设计竞赛和标准设计。1957年2期也介绍了波兰彼得·萨伦巴教授“实际的城市规划问题”的文章，以朝鲜的城市为例介绍现代城市规划的方法和问题。1957年10期为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还专门配发了一组四篇学习苏联经验的体会文章专辑。此外介绍莫斯科列穆士克9号街坊，罗马尼亚的城市规划，朝鲜城市的恢复与建设等，以及对苏联情况的介绍（1959年4期、8期）都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虽然1960年7月苏方单方面撤退专家后，因中苏争论还没有公开化，所以如介绍住宅箱形构件（1960年3期），波兰建筑展（1960年7期），西南区竞赛（1961年1期）照样刊出，当时莫斯科西南区的国际竞赛由清华大学建筑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和北京工业院合作，由中国建筑学会报送的方案被选为17个优秀方案之一，文章对竞赛情况做了介绍。直到1962年4期、8期还有苏联厂房和捷克辐射采暖的介绍，但比后相关的介绍基本就看不到了。在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口号下，对国外情况的介绍则多限于对外经援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出国考察报告，如非洲热带建筑（1962年10期），印尼、柬埔寨、缅甸、古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筑介绍（1963年各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墨西哥、加纳、几内亚、叙利亚（1964年各期）。而从1965年停刊到1978年底，《学报》上基本没有关于国外建筑的消息，进入一种“锁国”状态。

在五十年代“一边倒”的时候，《学报》为介绍西方国家的建筑思潮和科学技术也曾做出过努力，如罗小未、罗维东、周卜颐等先生所写的介绍西方建筑大师密斯、格罗庇乌斯等人的专文，这大概也是国内最早有关这些人的系统介绍，周卜颐先生还专门写了“近代科学在建筑上的应用”长文（1956年4期、7期）。《学报》还开辟了“国外建筑简讯”专栏，以每期2~8页不等的篇幅介绍西方国家的建筑实录和信息，如57年7期用2页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悉尼歌剧院国际竞赛的三个优胜方案，在当时也算速度比较快的了。随着“反右”运动中批判对于苏联建筑的攻击和批判鼓吹资本主义的“新建筑”之后，类似的报道和专文就极少了，1959年6期有过一次关于1958年布鲁塞尔国际博览会和法国馆的介绍，但编者特别注明这是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建协大会时，法国建筑师的热情友好表示。此后刊登过一篇“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建筑的若干问题”（1962年11期）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筑已“病入膏肓”。1964年10期刊登过“评西方十座建筑”，认为西方“新的形式主义建筑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们的形式本身愈来愈丑”，基本是持批判态度。所以这时的状况正如戴念慈先生所说（1984年2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完成任务，说明本身的技术能力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建设。但是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消极面是，对国外的技术经验（包括西方的和苏联的）产生了一概排斥的情绪。这种情绪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点。……这种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状况，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使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正在逐步缩短的科技差距，反而变得更大了。”

在早年有关建筑方面的专业媒体很少的情况下，《学报》还负有报导我国对外建筑交往活动的任务。建国以后，即逐渐开展了建筑师的国际交流活动，1953年6月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参加波兰建筑师代表大会，次年6月中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国际建筑师会议，恐怕是比较早的国际活动了。此后在华揽洪先生与他在国际建协的好友的联系下，学会的8人代表团在1955年7月参加了在海牙召开的国际建协第四次大会，中国成为国际建协的会员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参加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组织。此后在57年的巴黎国际建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杨廷宝先生还当选为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副主席并连任一届。在当时的形势下，除去东欧国家外，和西方的同行也有交往，这些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报》上都有所反映。在1978年和国际建协重新确立了联系以后，吴良镛先生还担任过副主席，周荣鑫、何广乾先生等六人担任过理事，中国建筑师在国际建协中越来越活跃，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建协多次在华举行执行局和理事会，尤其是中国从1985年开始申办，经4次8年努力，在1993年申办成功，并于世纪之交的1999年成功地举行了国际建协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和第21次代表大会，这是亚洲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大会。《学报》做为最主要的学术传媒，先后发布新闻公告，组织委员会的活动，并在1999年用1、6、7、8四期的篇幅及时刊登了有关的主旨报告和学术论文，此后还有对《北京宪章》评论的文字（2001年1期）。《学报》在国际建协和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建筑师之间起了重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

自“文革”后1972年学会恢复了外事活动，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对外交往更加频繁。从80年代起，《学报》开辟了“国外建筑”和“学术交流”专栏，可以理直气壮地介绍国外建筑经验和学术活动，自1986

年加入亚洲建协后,国际与地区性学术活动有增无减。如从第一届起介绍了阿卡·汗奖的评选及获奖项目(1981年8期、1987年5期、1990年3期),并集中报道第六次阿卡·汗国际学术讨论会《变化中的乡村居住建设》,这也是较早的大型国际建筑学术会议。此后各种学术会议均陆续有论文发表,如“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1986年2期)、“转变中的亚洲城市与建筑”国际学术研讨会(1990年2期)、“北京国际体育建筑学术交流会”(1991年2期)、“第六届亚洲建筑论坛”(1992年1期)、“国际建协大会论文”(1993年5期)、“建筑师职业的未来”国际研讨会(1993年7期)、“建筑学会50周年论文”(2002年1、2期),都交流了相关的经验,提供了新理念,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类似的“国际会议”、“高峰论坛”也越来越多,但《学报》始终本着踏踏实实,不哗众取宠、不商业炒作的方针予以反映。

与港、澳、台等地区的交流也是《学报》对外交流的一部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学术活动才得以大规模展开。如学会很早就提出六条建议呼吁海峡两岸建筑界共同努力加强交流(1981年12期),另外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交流不断,在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988年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此后在曼谷、北京、台湾、杭州陆续举行了活动,大大增进了两岸建筑界的彼此了解和交往。此外关于香港建筑师的情况和香港建筑界,也在香港回归前有集中介绍(1997年3、6期),澳门的城市和建筑也在1999年12期有专门篇幅介绍。

《学报》随着开放的形势,其作者群和报导内容也逐渐更为国际化,除了我国的作者介绍国外建筑和国外建筑师以外,越来越多的国外建筑师、评论家和学者也直接为《学报》写稿。如英国D·拉斯顿爵士、澳大利亚的J·安德鲁斯等,恐怕都是第一批被中国建筑师看到的外国作者(1983年7期),而国外建筑师在《学报》介绍自己的设计作品最早大概是日本山本忠司先生的青龙寺空海纪念碑(1983年5期)。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市场的开放,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国际竞赛,国外建筑师的专稿,都使我国建筑师的眼界更为开阔,此处就不再赘述。

(四)

《学报》的五十年历程又是我国建筑师个人和群体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和进取的重要见证,在这个舞台上,前后几代建筑师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论文,他们的评论展示了他们的智慧和才华,表现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也道出他们的困惑和焦虑。老一辈建筑师的文传身教,使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中国建筑事业执着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当时,传入我国只有几十年的建筑师这个职业,在经历了解放以后短暂的设计事务所阶段,很快成立了国营的建筑公司和设计单位。如1949年10月成立的永茂建筑设计部(1953年改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1953年改称中央建工部设计院),1952年的上海市建筑设计公司(后改称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并随着1952年中央政府建筑工程部的成立,和对苏联设计体制和管理方式的全盘引进,确立了设计院和工业建筑设计院的体系,主宰了中国建筑界几十年之久。当时除少数民用设计院,大量的设计院由民用转为工业,承担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各种工业建筑设计。统一模数、标准图册,包括热电厂、水泥厂、印刷厂、纺织厂、机车厂、构件厂、肉类加工厂、农业拖拉机站……及相应的厂前区,生活间等占早期《学报》相当大的篇幅。当时的文章虽然也有少数是用设计单位或基建办各义署名,但大多数还以作者的名义发表,并注明其所属设计单位,说明当时还比较注重个人文责。从1958年起,在《学报》文章中以单位名义发表的逐渐增多,诸如设计院、建设厅、工程组、教研组,到1959年首都国庆工程专刊时几乎都是以集体名义发表的,估计和1958年“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批判设计人员“追求个人杰作,树立个人纪念碑”有关。而六十年代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精神传达后,个人署名的文章又逐渐占了版面的大部分。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各期,又回到了单位集体署名的状态。文革以后(1973年)《学报》再次复刊,除了单位署名的特色外,还增加了带有“文革”色彩的谐音笔名穿插其间,诸如“石华坚”、“程健”、“荆圭华”、“荆鉴元”、“胡建城”、“郭建言”等,这种状况到1978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此后一直比较正常地运作至今。这个简单的文章署名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当时建筑师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精神状态,而署名的不清也为此后增加了不少署名权的纠纷和麻烦。

随着改革开放,原有设计院的体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外建筑设计的进入,从1984年起建筑设计单位的体制改革开始起步,戴念慈先生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了在建筑设计上所有制的设计单位并存的可能性。1984年秋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建设部北京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虽属全民所有制性质,但实行企业化管理自负盈亏,按负责人王天锡的话,即探索设计单位小型化,业务范围专业化,组织系统单一化,并在《学报》1986年8期、1988年1期的专辑介绍了他们“新路新探”的设计作品选,展现了事务所在创作上的激情和活力。1987年7期又介绍大地建筑事务所(国际)的设计作品选,这是1985年1月成立的中外民办合作单位。再后有1987年10期北京中京建筑事务所作品选,这是在1985年2月批准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这些专辑的刊登起了重要的引领和交流作用。与此同时不同体制、规模的设计院、高等院校、设计顾问公司,设计事务所的设计作品选陆续在历年有所刊登,这不但是各设计单位业绩的表现和交流,同时在新的形势下,也有重要的展示和推介作用,也成为近十几年来《学报》的重要栏目。建筑师个人的作品集和国外建筑师或事务所的专辑也时有所见,如正阳小组作品选(1990年4期),熊明1993—1995作品选(1995年12期),日本久米设计作品选(2002年3期)等。

与此相呼应还有《学报》关于建筑评奖和建筑师执业注册的相关栏目。这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建筑界

开展的重要活动。自1984年起建设部评选优秀建筑设计奖,《学报》做为获奖项目的公布、介绍、评析的权威刊物,都占有重要篇幅,得到广大建筑师的密切关注,此外还有中国建筑学会的建筑创作奖、青年建筑师奖,教育部的全国优秀教育建筑设计奖,中建总公司优秀工程设计奖等,都可称之为不同系统、不同部门的优秀作品的检阅和交流,同时也起到了示范和导向的作用。

《学报》的五十年是重要的理论及史实的纪录,各代建筑师通过精心经营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和理想追求。《学报》创刊号上梁思成先生的论文“中国建筑的特征”提出“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另一位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奠基者刘敦桢先生的“中国住宅概说”是系统研究中国住宅的第一篇著作(1956年4期)。1959年5月~6月,建工部和建筑学会在上海联合召开了“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除4天讨论住宅问题外,其余时间都在讨论建筑艺术问题。这是建国以来、反右以后建筑界比较畅所欲言的一次会议,许多发言也成为研究建筑理论和建筑史的重要文献。如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刘敦桢、陈植、赵深、哈雄文、陈伯齐,第二代建筑师吴良镛、汪坦、戴复东的发言(59年6-8期),并在59年9-10期合刊上刊载当时建工部长刘秀峰的“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长文做结。此后影响较大的一次学术讨论恐怕就是85年底在广州召开的“繁荣建筑创作学术座谈会”,这也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之初的一次重要会议。虽然第一代建筑师中林克明、唐璞等先生参加了会议,但会议的主体发言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建筑师了,《学报》在86年用5期(2、3、4、6、7)的篇幅对发言做了介绍,也可见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第二代建筑师中张镈、赵冬日、龚德顺、刘开济等人发了言,戴念慈先生以“论建筑的风格、形式、内容及其它”为题做了总结发言。而其他的第三代建筑师已经成为创作的中坚力量。如果和《学报》56年6期发表蒋维泓等人“我们要现代建筑”一文之后引起一连串的政治批判相比,这时的创作环境和气氛确实要宽松得多,如在建筑学会指导下84年4月成立的民间“现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小组”,首先在《学报》84年4期发表了“现代中国建筑创作大纲”,并在同年7期发表了该小组在武汉召开的首次中国建筑创作研讨会,小组的一大批建筑师成为此后一段时期内建筑创作和理论探索的活跃力量,也可见理论与创作之间的促进与互动。随着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的成立,医院、教育、人居、体育、工业等专业委员会的设立,学术活动更加多样,也使《学报》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学报》同时也是建筑师发表自己最新理论研究成果的最佳首发园地,诸如城市设计、生态建筑、建筑经济、建筑技术、人居环境、教育改革、理论体系、地域文化……都是通过《学报》这个窗口使业界有所了解。

与建筑理论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是建筑评论,对建筑师的创作思想、建筑作品的评价,对建筑思想的分析、判断,也一直是《学报》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至今人们认为我国的建筑评论无论从队伍、水准、深度各方面都还有较大差距,但从学报的历史看,还是做了相当的努力,尽管其中要受到许多其它方面的干扰。如《学报》创建初期同济大学翟立林先生“论建筑艺术与美及民族形式”(55年1期)及此后与陈志华、英若聪二先生的讨论(56年3期,57年1、2期)和另外一些不同看法,争论还是十分热烈的。谭垣先生“评上海鲁迅纪念馆和陈列馆的设计”(57年2期),周卜颐先生“从北京几座新建筑的分析谈我国的建筑创作”(57年3期)对前门饭店的商榷(57年4期)及陈植、汪定曾先生和张镈先生的答辩都是观点明确、文字犀利,有肯定,有商榷。但57年反右以后的建筑评论则更多是批判,并在学术观点上更多地涉及政治问题。此后建筑评论一蹶不振,除少数技术问题的探讨外,很少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和争论,例如在人大大会堂设计过程中谭垣等先生的不同看法并未得到发表的机会并展开。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9年,当时《学报》第一期专门刊发了学会建筑设计委员会78年10月在南宁会议上关于建筑现代化和建筑风格问题的一些意见,发言的张镈、林克明、徐尚志、余庆康、哈雄文、吴景祥、刘鸿典、黄忠恕、洪青等先生都是第一、二代建筑师中的代表人物,还发表了陈世民的长文“试谈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从79年6期开辟了“建筑创作问题讨论”专栏,并根据邓小平同志视察住宅工程要求“多一些内行的人来挑毛病”发表了一组关于前三门高层住宅的评论文章。此后建筑评论又开始活跃起来。尤其是组织了一些有影响的设计作品的讨论座谈会,人们各抒己见,如82年9期对上海龙柏饭店的创作座谈会,在设计人介绍了饭店设计构思的基础上,人们对作品的得失进行了分析,83年3期发表了香山饭店的设计座谈会,尽管设计者贝聿铭先生当时已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建筑师,但并没有影响与会者实事求是地对作品的肯定及提出批评意见,尤其是在选址、平面布置、与环境关系等方面提出的许多看法,时至今日还是很有启发性的。此后还组织过对北京长城饭店、曲阜阙里宾舍、杭州黄龙饭店等工程的座谈,(86年1期,7期,88年10期)这些都对当时全国旅游宾馆的建设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此外还有关于琉璃厂文化街(86年4期),维护北京古都风貌问题(87年4期),亚运会工程(91年2期),上海新建筑(91年8期),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92年1期),曲阜孔子研究院(2000年7期),北京八一大楼(2000年11期),浙江大学新校区(2004年1期)等,基本上都能够比较客观地对作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上个世纪以来,在一些国家和地方的重大工程项目上,由于国外建筑师和新理念、新手法引入,在建筑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如国家大剧院,在99年3期,2000年1期,11期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发表,但与社会上对这个工程和其他一些工程如北京中央电视台,奥运工程等项目的热烈讨论相比,《学报》并未及时反映出人们所关心的这一敏感热点,即使有所反映似乎也是比较情绪化、简单化的判断。

与我国如此巨大规模的建设量相比,当前也许人们也更多地关注于埋头创作,对评论无暇顾及,建筑

评论中缺少了一些有分量并言之有据、评之成理的中肯文字，在社会上更多地看到一些商业的包装和炒作，动辄“扛鼎之作”“大师手笔”，象早期《学报》那样那种观点鲜明的评论反倒不多见了。别林斯基曾说过：“关于伟大作品的评论，其重要性不在伟大作品本身之下。”对于进一步繁荣建筑创作、选择正确的方法和道路、并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现实来说，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建筑评论显得更重要了。

(五)

《学报》虽几经曲折，但最终和我国的建设事业同步，走上了较为宽松顺畅的坦途。梁思成先生在50年前《学报》发刊辞中明确：“《建筑学报》是一个关于城市建设、建筑艺术和技术的学术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指导性的理论论文和重要的技术论文。本学报有明确的目的性，它是为国家总路线服务的，那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和建筑服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和建筑不只是经济建设，同时也是祖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学报》在坚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原则的同时，继续坚持刊物的综合性、学术性、权威性，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回顾50年历史的基础上更好地面向未来，面向世界。

在回顾《学报》历史时，我们十分怀念历届编委会的负责人梁思成、汪季琦、金瓯卜、汪璧、王华彬、赵冬日、周卜颐、严星华、郑孝斐、王申祜、张祖刚、齐立根等前辈的辛勤努力。当然还有历届编委会编委们的鼎力襄助，我们谨列举第一届编委会的成员，他们是：梁思成、汪季琦、朱兆雪、吕有佩、林徽因、武良诚、陈伯齐、莫宗江、黄作桢、郭毓麟、程应诠、贾震、杨耀、赵深、廖祖裔、叶德灿。是他们为《学报》奠放了最早的基石。

翻阅400多期《学报》，更感到编辑部几代编辑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早一点的我不了解，从彭华亮前辈的回忆中提到的有章宏序、郭毓麟、邱式淦、商友菊等人，因为时间太早都没有接触，但此后因工作关系，陆续遇到张钦哲、冯利芳、陈衍庆、顾孟潮、王天锡、吴国力、周畅、范雪、曹达、王晓新、胡慧琴等人（如有遗漏万望见谅），从接触中深切感到他们甘为人梯、默默奉献、“为他人作嫁衣裳”、扶持和帮助了一代又一代的新老学人，也成为我的老师和好友。现在编辑部自然又补充了新鲜的血液。

《学报》之所以能赢得国内外读者的重视，享有很高的声誉，还应该感谢遍布全国的历届特约组稿人和一大批活跃的作者群。他们为刊物的综合性、学术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50年来，对论文和作者的分析尚未见到全面的整理，但95年12期刊登了对1988—1992年的5年间60期的830篇论文的分析，从中也可看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结论。如这一阶段发表文章1—2篇的作者占总数的93.8%，说明作者面广，队伍庞大，基础扎实，发表3篇以上的占6.3%，发表5篇以上的仅占1.8%，说明活跃的作者群的比例还有待于提高，并需避免作者的“老化”，以保证更广泛的权威性。从作者地区分布看，北京的作者占了人数的39.4%，论文的41.4%，表明了作者地区分布的不均匀性，尤其是西部地区，当然这里面也有80年代以后国内建筑类杂志较多分流了一部分作者，但作为全国性的综合刊物，地区的广泛性还是要加强的。另外，台湾、香港地区的作者和论文仅占0.3%~0.5%，国外作者数仅占3.1%，论文数占3.7%，也说明《学报》作为核心刊物，要继续发展壮大、走向亚洲、走向世界还有较大的差距。从论文作者和数量的单位系统分布看，集中在设计院系统的70个单位和41所高等院校，其作者数和论文数各占到了66.7%和64.8%，说明他们是科研和设计实践的基本队伍，但随着设计科研队伍体制的多元化，房地产事业的发展，作者所属系统也随之多样化，如事务所、公司、开发商、制造商、业主等行业，也集中了大量建筑师和相关人才，需要反映这些方面的学术成果。

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学报》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面临的挑战更是严峻的。随着城镇建设的热潮，随着人们需要和诉求的更多样化，随着众多各类专业、非专业期刊的竞争，随着传播媒体的传播方式的扩展，随着……，《学报》的同仁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过去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有把《学报》称之为“官方刊物”的说法，我想一方面我们的媒体园地应该由各种不同宗旨、不同对象、不同风格的刊物组成，我们需要急用先学的快餐式、轻松趣味的消闲式、推销炒作的商业式、目标单一的专业式、更需要《学报》这样遵循“贯彻党的建设方针，探讨中国建筑创作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建筑学科发展，提高建筑创作水平，为建筑设计、教学、科研工作者服务”的宗旨的出版物，这样才能互相补充、互相竞争而共同提高。而坚持这样严肃的宗旨并不意味着杂志的刻板面目，而关键在于其内容能否涉及了社会 and 大众关心的焦点、热点，能否能对业内外人时起到借鉴和启迪作用，能否在保持综合性、学术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读性，能否能在“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下活跃学术的正确导向，办出自己的特色。总之《学报》如何从一份国内的学术刊物逐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各国建筑界所关心，向世界介绍我国建筑师的成就和经验，并汇入国际建筑刊物的竞争洪流中才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这需要广大编者、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关心和奋斗。

在《学报》创刊50周年之际，谨以下面的句子为贺：

集百家聚编者作者读者几代蓝缕筚路
逢五秩综技术学术艺术多科并蓄兼收

《建筑学报》五十年光辉业绩

张祖刚

今年是《建筑学报》创刊50周年，这里回忆这不平凡的50年，它记录了创刊与发展、停刊、复刊与大发展三个阶段的历史发展情况和光辉业绩。这50年中间虽然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都是按照党的建设方针政策，各个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各阶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组织、发表重点稿件，起着引导性的作用，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建筑学科的发展服务。这些光辉成果，是在党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由先后100多位学报编委（名单附后）、30多位编辑部人员和广大读者、作者以及出版、发行人员付出艰辛劳动、努力工作所取得的。其中，担任学报编委、编辑、作者的老一辈领导、专家和建筑科技人员的无私奉献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下面简要回顾三个阶段。

一、创刊与发展时期（1954年—1966年6月）

按照规定，全国性学会必须要办一个会刊，它代表本学科的学术水平。为此，中国建筑学会第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定出版学会的刊物——《建筑学报》。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第一、二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确定，由梁思成副理事长任编辑委员会主任，负责编辑出版会刊《建筑学报》工作。经研究，梁思成先生在《建筑学报》发刊辞中明确地提出了办刊的宗旨、目的：“《建筑学报》是一个关于城市建设、建筑艺术和技术的学术性刊物。内容主要是指导性的理论论文和重要的技术论文。本学报有明确的目的性，它是为国家总路线服务的，那就是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和建筑服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城市和建筑不只是经济建设，同时也是祖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在这一办刊思想的指导下，梁思成先生组织审定稿件，于1954年6月出版了第一本《建筑学报》，这一年共出版两期，第1期为8开本，封面四周镶一金边，大家简称创刊的第1期学报为“金边学报”。后因遇上反对建筑复古主义，1955年暂时停刊，1956年复刊，当时专职编辑人员极少，只有彭华亮、商友菊、李跃媚3位同志。1957年中国建筑学会换届后，第二届编辑委员会改由汪季琦先生负责，此后编辑部人员调整并增加了一些，有彭华亮、王申祜、齐立根、王素珍、郝佩君同志。1962年换届成立第三届《建筑学报》编辑委员会，由金瓯卜先生任主任委员，根据发展的需要，编辑部人员又增加了陈衍庆、张钦哲、冯利芳同志，1965年学会秘书长华怡庚先生邀请郑孝燮先生和我到学报编辑部工作，此时编辑部已有10位同志，由郑孝燮先生负责。这一时期自创刊至1966年“文革”前，按照国家第一至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需要，按照中国建筑学会学术活动的中心议题内容，集中报道了广大职工住宅与居住区建设、工业厂房设计和医院、商店、学校、剧场等公共建筑工程，特别是1959年在建国10周年之际，学报发表了由建筑工程部部长刘秀峰把全国各地知名专家教授的论点汇集、整理、提炼成的总结报告——“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这篇试图开拓中国建筑创作新道路的理论文章，是认真总结建国10年来的建筑创作与建设的经验，为建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起着引导的作用。

二、停刊时期（1966年7月—1973年9月）

“文革”开始后，中国建筑学会成为重点被批判单位，《建筑学报》被迫停刊，《建筑学报》发表的刘秀峰“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筑新风格”成为批判的重点，被全盘否定。“文革”后期因外事活动的需要，1972年恢复一个由3人组成的中国建筑学会办事机构，1973年开始筹备《建筑学报》复刊。

三、复刊与大发展时期（1973年10月至今）

1973年调回白瑛、张钦哲、冯利芳、杨建庠和我，为复刊《建筑学报》作准备工作，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于1973年10月恢复出版了停刊7年多之久的《建筑学报》。但此时的学报仍受“文革”后期的政治影响，按规定刊登了一些政治性文件的内容，编辑部人员增加了王申祜先生和李秀芬、赵晓晨同志。学报真正恢复其学术性，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4月阎子祥同志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十分重要，会上宣读了同年3月3日国家建委作出的为学会平反的决定，肯定了学会在“文革”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恢复了学会和《建筑学报》的名誉。此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学报亦步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80年10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了第五届理事会，由王华彬副理事长直接负责《建筑学报》工作，1981年组建了由老中青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报第四届编辑委员会，王华彬先生任主任委员，编辑部人员作了调整，除原有张钦哲、李秀芬和本人外，后又充实有齐立根、顾孟潮、王天锡、吴国力（后调出）、周畅、范雪、曹达、王晓新、卢国洪、纪树柏等。在这一时期，进一步明确了“面向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服务”的办刊方针，努力开拓创新，广辟稿源。既报道城乡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刊登城乡发展开辟新途径的文章，把近期建设需要同远期发展方向结合起来，继续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着重选择联